

学习哲学 做好工作

——毛泽东八篇著作辅导材料



重 庆 出 版 社



2 041 8944 9

学习哲学 做好工作

——毛泽东八篇著作辅导材料

重 庆 市 哲 学 学 会 编
重庆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重庆

封面设计：高济民

学习哲学 做好工作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印 制 一 厂 印 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75 千
1982 年 7 月第一版 198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600

书号：2114·1

定价：0.66元

编 者 的 话

为了适应全国干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需要，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委托重庆市哲学学会、重庆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组织部分会员编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八篇著作的辅导材料，这些材料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介绍毛泽东有关哲学思想时，注意将他前后的思想联贯起来，注意将他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起来。力求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考虑到干部学习的需要外，还考虑到哲学爱好者的情况，力求做到通俗易懂。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对读者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本书主编为西南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重庆市哲学学会会长杨炳勋同志，参加编写的有西南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讲师刘传彝、胡次林、王永成、李兴正同志和刘同华同志。

由于时间紧迫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书中缺点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四月

目 录

坚持毛泽东思想 学好毛泽东哲学著作·····	杨炳勋 (1)
《实践论》学习辅导材料·····	刘传彝 (22)
《矛盾论》学习辅导材料·····	刘传彝 (6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辅导材料 ·····	李兴正 (95)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辅导材料 ·····	刘同华 (126)
《论持久战》学习辅导材料·····	李兴正 (148)
《战争和战略问题》学习辅导材料·····	王永成 (174)
《新民主主义论》学习辅导材料·····	胡次林 (200)
《论联合政府》学习辅导材料·····	胡次林 (227)

坚持毛泽东思想

学好毛泽东哲学著作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我党历史上一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重要历史文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总结了建国卅二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科学地回顾了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六十年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的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炎黄子孙是勤劳智慧的民族,过去曾经有过四大发明,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

压迫，使我们的祖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多少革命先辈，多少有识之士天天在探索拯救中国之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医学救国，都失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奔走一生，临终时仍呼喊着“团结、奋斗，救中国！”。但他们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缺乏正确了解，对中国的社会情况和各阶级情况缺乏正确了解，因而未能找到一条正确的拯救中华的道路，未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给人民指出了出路，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决议》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党的“一大”就宣布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废除资本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这个主张就是我们党不同于当时的国民党及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主要标志。党的“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指示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特点，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主张，第一步是：“消灭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第二步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1923年党的“三大”提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促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北伐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镇压革命，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加之党内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致使大革命

遭致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党及时地发动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及周恩来、贺龙、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建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使革命力量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致使革命又遭到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红军被迫进行了震撼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军和全党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能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挽救了中国革命，胜利完成了长征，迎接了抗日救国高潮的到来，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后，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的主张，促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1941年和42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年代。为了战胜困难，迎接胜利，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从思想上肃清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根源。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就，为“七大”的召开，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七大”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

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伟大成就。

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并取得胜利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内外反动派在一定时间内曾经暂时是强大的，他们无时不在妄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使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忘记“攘外必先安内”，对共产党“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拒绝对中国国情、历史特点和革命特点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不是照搬书本或外国经验，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相信不依靠中国的工人、农民，不能真正区分敌、友、我，因而导致革命的挫折或失败。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贺龙等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作指导，对二十世纪国际形势作了认真分析研究，特别对中国的历史，革命的特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各阶级特别是敌友我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很好的结合起来，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制定了正确的战略

策略、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从而产生、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经过艰难曲折而走向了胜利。

为了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革命的真正动力，朋友和敌人，回答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工人、农民、国民党的错误看法和态度，毛泽东同志于1926年初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明确区分了敌、友、我。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三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页）并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页）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调查，同年三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

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3页）1927年夏季，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发动了“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主要地就是利用了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这一点。国民党的叛变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正确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预见，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表明毛泽东同志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

1937年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哲学上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批判了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深刻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在许多问题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哲学。这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第261页)并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阐明了认识的发展规律：“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精辟地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说明“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2页)同时还把群众路线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首先把对矛盾学说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提高到两种宇宙观的高度，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紧紧抓住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从矛盾学说、辩证原理方面批判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集中阐述了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批判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倾向。

1937年至195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际斗争中广泛运用，并取得辉煌胜利和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时期。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论战的总结，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各种矛盾的特点分析出发，指出要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反复实践，找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

点，中国革命要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他说：“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5页）并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1页）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两篇著作，回答批驳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内外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把希望只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的错误认识，驳斥了关于抗日战争前途的所谓“抗战必亡”和“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在两篇文章中强调要从中国特殊性出发，要具体分析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各种矛盾的特点。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理由。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具体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分析了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特点，给了当时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以有力驳斥，他指出：“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08页）“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10—411页）问题的根据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

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15页）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预见的正确性。毛泽东同志在解决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后，党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产生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着克服党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11月6日发表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特殊矛盾出发，分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矛盾的双方的军事战争的历史特点，指出必须根据自身特点独立自主地规定自己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他引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8页）说明“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7页）从而指出中国革命斗争是以战争解决问题。为此，必须依靠广大农民武装建立军队，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红色根据地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这样，就使全党更明确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

上的首要地位，动员了全党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从而取得了全党在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使全国人民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但是到了40年左右，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把全国人民又打入了闷葫芦里。于是中国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为此，毛泽东同志首先指出：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为了真正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出路，大家必须抱定一种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态度即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反对“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狂妄的唯心主义的不科学的态度。真理只有一个，真理不是以人们主观的感觉夸张而是以客观实际、以千百万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为标准。毛泽东同志从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革命形势和特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正确地得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6页）他从唯物史观出发，认真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特点，指出：在政治上，应以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作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力量，而无产阶级必须是领导力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她区别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区别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政治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因此，在经济

上也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领导下，采取“节制资本”，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实行“平均地权”的方针。在文化上，在观念形态上，则应是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東西。毛泽东同志还批驳了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从变化了的环境出发，混淆不同质的区别的种种谬论。他有力地驳斥了所谓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这是过去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变了，此路不通，帝国主义不容许，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也驳斥了马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倾空谈主义，指出：中国将来一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不行，现在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不能混淆两种不同质的革命阶段，实行“一次革命论”。他也严厉地批驳了顽固派混淆新旧三民主主义的质的界限，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7页）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1945年，正当即将打败日本侵略者，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对革命对中国有利的时候，国内又出现了分裂和内战的危机，又提出了中国怎么办的問題。毛泽东同志科学的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正确地给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作了政治报告，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分析了国共双方所实行的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明确指出：“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

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1页）……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7页）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0页）并提出了全面的具体任务。为了保证政策的执行和完成规定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应该具有的工作态度：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党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者辩证关系的原理，认真分析了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工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特点，于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时期。1956年4月和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相互联系和对立统一的学说，从中国实际出